

如何让超级IP推动传统文化数字化和年轻化

■本报记者 王雪瑛

“沿着黄浦江两岸看过去，就知道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的‘神’、建设的英雄依然在，无数勇敢地、坚韧地去开拓建设我们共同生活的英雄在大地上行走着，而这生生不息的精神和信念直到现在依然是我们的文明和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阐释文化精神的话语充满着个性和生命的能量，在古今贯通中深化了第六届腾讯峰会的主题：生生不息，这是生命生长的渴望，是文化绵延的动力。

我们在时代的前行中，如何以智慧和激情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完成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让中国文化和经典艺术活起来、酷起来？如何让超级IP推动传统文化数字化和年轻化？来自历史与文学、电影与网络的专家、学者和作家展开对话和交流，探讨传统文化的时代光彩，中国故事的影像表达。

中华民族的创始英雄，都是建设之“神”

“生生不息的主题蕴含着‘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真理。这个‘生’，不仅仅是种族的延续，更是生存、生计、生产、生活，可以说这个‘生’，涵括着我们这个生机勃勃的文明世界。”李敬泽联系自己对《诗经》的阅读和回味，先人们从春秋收到制礼作乐开创新文明的历程，阐发了对我们的文明和文化新的认识。“我们中华民族的创世的英雄，我们的‘神’，几乎都是建设之‘神’，是教我们生产和生活的‘神’，黄帝教我们穿衣，神农尝百草，大禹是基建的神，带着我们治水。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神’和英雄，他们和我们现在一样，同样面对着充满不确定性、艰难的世界，他们在那个世界中带领着先民开辟文明，为我们建设一个美好的生产和生活的世界，这就是我们的文明，这就是我们的文明根本精神和根本信念。”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探究的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的缘故，他认为，“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始终在不断创新和更新；二是我们始终在开放。现在我们又拥有了前人所未有的新手段：互联网、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我相信，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具有生生不息的精神，长盛不衰的强大生命力。”

文化的传承并不是历史的重复，而是在新时代中重生。中国文化绵延不绝的强大生命力在于一代代人的心灵对话中展开的文化传播，

以人文底蕴赋能技术传播，让网络文学提升讲好中国历史的能力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近年来网络文学中的中国历史题材持续升温，不但在国内拥有大量读者，而且已经汹涌出海，收获不少海外拥趸。

阅文集团总编辑杨晨表示，网络文学曾经一度由幻想题材占绝对主流，这两年现实题材的占比越来越重要，历史题材不断抬头，弘扬传统文化，描写传统文化的作品越来越多。历史题材几乎渗透到每一个网络文学类型中，包括都市、玄幻、仙侠背景的小说方方面面都涉及到历史文化，而且这些类型的丰富度、涉及面也让我们吃惊。除了历史、考古、传统工艺、传统美术、相声曲艺，包括茶文化都有比较优秀的作品诞生。我们一度认为这样的作品都是中国人喜欢的，现在我们知道海外的读者，那些老外们也很喜欢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类的作品，甚至因为看了这些作品，他们去搜索、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让我们非常惊喜，说明网络文学作品的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生命力，具有与当代社会和世界对话的活力。

数字技术让中国传统文化以可知可感可观的新形式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让中国文化和经典艺术之美活起来、酷起来、火起来，滋养当代人的精神世界。腾讯集团副总裁、阅文集团CEO程武提出新文创战略，包括不断探索文化产业发展规律，提炼中国文化符号，扎根传统文化，深耕本土IP，讲好中国故事。腾讯新文创生态已经初步成型，涵盖网络文学、动漫、影视、音乐、电竞、游戏等多种数字文化形式，营造了一个丰富多元有活力的文化生态，仅阅文平台上就连接着900万名网络作家和4亿多位读者，好故事承载着人们的记忆、创意、想象，不断涌现，生生不息。

把红烧肉和米饭都做好，中国故事更美、更真实

目前中国电影市场强劲复苏，已经恢复到全球领先的地位。电影是一种极有表现力的综合性的现代艺术，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互联网时代，如何以影视艺术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是我们的文化使命，这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命题。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认为，中国电影带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又有着与世界文明对话和交流的自觉性和感染力。他提出，今天我们又进入了以中国影视“讲好中国故事”的新阶段，科技与人文的结合包含着文学、艺术、人类学与影视的结合，传统影视内容与新的传播媒体的融合。我们有很多作品通

过互联网走向海外了，如何让越是中国的越有国际传播力，依然是我们探讨和努力的话题。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大家更热爱中国文化，产生文化认同和文化凝聚力；我们更有使命感，要讲好中国故事给世界听，让世界成为世界故事一部分，为世界文明作出中国贡献。

“最中国的故事，我们也最应该讲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对当下的热播剧十分赞赏。“今年的电视剧《山海情》《觉醒年代》都很好，在基本面上重启了少年中国。《觉醒年代》重返历史青春现场，其中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三人的父子关系，展现了崭新的伦理亲情和政治关系，陈独秀和延年、乔年的辩论，呈现了两人探寻真理的风骨和格局。每当剧集打出主人公们的结局定帧照，我都极为感动。”

她还指出：“其实，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讲好中国大事，还要讲好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腾讯峰会的主题是生生不息，生生不息表现在电影里，就是要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讲好，‘生生’里有生活有生计，但目前的影视剧还表现得不够好……要把中国的红烧肉和米饭都做好，把中国日常生活做美了，中国故事就更真实了。”

影视作品又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选择优质的IP进行深度打造，是影视剧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满足观众审美需求的重要环节，电影人的责任重大，毛尖还“喊话”以腾讯为代表的各大互联网平台“应承担更多责任，自觉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

新丽电影总裁李宁先生在现场及时回应，“现在中国的年轻观众越来越多地喜欢我们的现实题材，喜欢中国文化和历史人物，还有当代生活相关的选题。比如《我和我的祖国》《你好，李焕英》。我们在影视选题上会深度研发。我们一方面开拓创新的类型，另一方面会积极发掘好故事，做好可视化改编，把它创作得更让观众接受，将阅文的网络作者生态打造成更加可持续、可延伸的发展空间，在电视剧、网剧、网络电影、动漫、动画、游戏、衍生品、主题乐园等一系列作品来探索，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现在的美好生活展现在影视作品中，让更多的观众在电视屏幕上、视频平台上、电影院里欣赏好作品，看我们的中国故事，为人物的精神所感动，这是我们一直想追求和遵循的，让好故事生生不息是我们的理念。”

真诚地投入创作，因为“作品出来是有考官的”

作家滕肖澜创作的长篇小说《心居》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对当下的热播剧十分赞赏，“今年的电视剧《山海情》《觉醒年代》都很好，在基本面上重启了少年中国。《觉醒年代》重返历史青春现场，其中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三人的父子关系，展现了崭新的伦理亲情和政治关系，陈独秀和延年、乔年的辩论，呈现了两人探寻真理的风骨和格局。”

(2020年出版)就是腾讯影业已经发掘的好故事，缘此滕肖澜与腾讯影业合作，改编她的展现上海城市生活的《心居》，她首次以编剧的身份实践着怎样以影视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滕肖澜说，从小说和影视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的创作中，“感受不少，受益很多”。“我写作的小说大部分背景都是上海。在创作《心居》的时候，想要写出对全面反映当下上海各个阶层百姓生存状态的小说。在改编剧本的时候，也希望展现出真实的生活内容，不想通过戏剧性的渲染或是过度夸大地域特色，而是展现真实、自然、感性的上海。作品出来是有考官的，考官是上海人，包括老上海人、新上海人，他们如果说，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当下时空中零距离的上海。身为上海作者，有

幸把上海的故事真实地展现在屏幕上，让更多人了解当下上海普通百姓生存的状态，这是让我深感荣幸的事情。”

作家以真情实感塑造人物，真实细致地展现城市生活，只有真诚投入的创作，才能赢得观众的共情和共鸣。真实和真情是艺术作品的生命，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仲伦提出，我们的影视作品要真实地体现五千年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基本品格。我们的艺术家、创作者、制作者要真正地把握好，向世界真实地展现中国人的自信和谦逊，要塑造可信、可亲的中国形象，可爱、可敬的中国人的形象，我们要思考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提升中国电影的品质，这是我们重要的文化使命。

专家视野

从小说到戏剧，原有的规则正在改变

——从近期上海舞台上多部自文学改编的话剧说起

杨扬

由春至夏，不断回暖、逐渐升温的上海话剧市场陆续上演了一些引起较大关注度的作品，其中就有胡宗琪导演的《尘埃落定》、周小倩导演的《长恨歌》和波兰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的《狂人日记》，这三部作品有个共同特点：从改编小说开始。小说改编戏剧，对戏剧而言并不是新鲜事。李健吾先生曾指出，小说改编成戏剧，并不意味着小说的成功一定会带来戏剧的成功，对照2021年的这三部话剧，有一些变化正在考验着我们原有的戏剧规则。

《长恨歌》《尘埃落定》都是中规中矩的，王安忆评价话剧《长恨歌》，认为包括影视剧在内的所有改编中，“话剧最靠近我”。而阿来对话剧《尘埃落定》的评价，认为小说原著的精气神都在，“水乳交融，天衣无缝”。

《长恨歌》编剧赵耀民用三幕戏来表现王琦瑶跨越四十年的情爱生活，从戏剧结构来说，前后对称，非常饱满。但看着看着，你会觉得有一点不满足。这种不满足源自于观众对人物结局的某种期待。好像王琦瑶最后有点游离于她的性格，变成了另一个有点风尘味的不相干的女人。一生从没有主动追求过别人的王琦瑶，到了生命的后半段，突然改变了，变得有点盲目主动，热衷于各种热闹和时尚。目前这样的剧情和结构安排，是对应着第一幕的结构，第一幕是王琦瑶被别人追，最后一幕是王琦瑶追别人。这让我想到黄佐临先生援引川剧大师张德成的话——“不像不成戏，太像不艺术。”一部戏剧作品编得太像戏了，有时反倒达不到最佳的戏剧效果。话剧与中国传统戏曲不同，不能走程式化的道路，为结构而结构，而是要破圈、走新路。

话剧《尘埃落定》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戏剧的叙述语言和结构上。作品讲述了阿坝藏区土司家族最后的瓦解历史。作品是借土司的二儿子傻子的叙述来结构全篇。这个傻子既是全剧的叙述者，又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一个人物，有时是清醒客观的旁观者，有时又是懵懵懂懂沉浸其中的当事人。现代戏剧表演中所常见的布莱希特的间隔手法，在《尘埃落定》中非但没有节制地掌控着舞台的表演节奏。话剧的结构是从未知的过去走来，最终走向死亡的宿命。舞台美术也十分出彩，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美术的自然呈现。

但一些观众认为《尘埃落定》是一部朗诵剧，而不是话剧。编剧忠于原作，导演忠于剧本，演员忠于剧作和导演意图，但整个

舞台似乎没有充分活动开来，是一个一个片段在动，而不是整出戏在展开，达到像花一样依次盛开绽放的惊艳效果。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回到在上海戏剧界引发激烈讨论、甚至出现几乎完全相对立意见的陆帕的《狂人日记》上，这位波兰导演的戏剧观念延续着后现代的脉络，特别是格洛托夫斯基的“质朴戏剧”的观念。在“质朴戏剧”中，强调戏剧的主体是演员-观众，所以，那些反客为主、影响戏剧的因素，包括与戏剧没有直接关系的文字符号，都要删掉和去除。陆帕的“做剧法”极其简约，他不要演员背诵台词，而是情景发挥。没有预先设计好固定的台词，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让观众直面观众，用表演点燃观众。编导、舞美和演员，在这一过程中要成为最简单积极的要素，而不是相互牵绊的力量。

在中国，话剧艺术是舶来品，根基浅，积累少，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洋腔洋调，流于“话剧腔”的形式主义泥潭。所以，焦菊隐、黄佐临等艺术家们始终都在探索中国话剧的民族化出路，希望话剧能够真正融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去。他们在总结自己的话剧舞台经验时，都强调阅读文学作品的重要性，要求多看多读文学作品，熟悉和了解文学作品人物，尊重文学作品的原貌，领会作家作品的精神。他们同时又很注意话剧艺术自身的特点，强调将文学作品搬上舞台，不是原封不动、照搬照抄，而是要根据舞台艺术的表演特点加以取舍。

曹禺、夏衍和老舍都是著名的剧作家，他们开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三种创作模式。一种是严格的三一律戏剧，像曹禺《雷雨》的时空结构就是，自成一体，结实紧凑，电光雷鸣，一气呵成。还有一种是时空切割，分割成多个碎片的戏剧结构，像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五户人家，五个小空间，很家常，很平淡。但这种平淡就像优秀的散文作品一样，有一种淡淡的诗意，正如别林斯基盛赞的“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显出了作者过人的才

华”。另外一种“图卷戏”结构，这是李健吾先生对话剧《茶馆》的经典概括。通过研读这些剧作家的创作谈，让我联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大师之后，很少有剧作家能够超越他们？文学文化修养和经验积累其实就是一道分水岭。

在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涯》（杨衍春译）时我体会到，戏剧理论思考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学等艺术门类触类旁通。除了与演员、剧团交往外，斯坦尼与很多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交往，像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梅特林克、高尔基等，这些文学家加深了他对艺术问题的深入思考。而德国阐释学家伽达默尔的回亿录《哲学生涯：我的回顾》中，记录了他与布莱希特以及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密切交往情况。中国的戏剧家似乎并未亲身经历了伽达默尔类似的密切交往关系，但布莱希特与哲学家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使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思考获得了方法论上的帮助，同时也给伽达默尔在内的哲学家们以艺术创造的灵感。换句话说，德国戏剧的理论突破，不是局限于戏剧领域，而是与哲学、文学同步展开。德国戏剧之所以能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其中原因之一是它总有一种不满足于现状的理论冲动，希望理论跑到戏剧实践前面，给戏剧探索提供某种观念上的支持。

再回看中国戏剧艺术的发展历史，经历了上世纪五四时期及80年代两个重要时期的变革，才有我们今天现行的戏剧规则。但这样的规则是不是一劳永逸、不可更改的？新世纪以来，这种潜在的改革呼唤，似乎还在滋生滋长。因此，对于文学改编戏剧的关注焦点，应该深入到当代戏剧变革的可能性和多样性问题上。哪怕包括伽达默尔在内的哲学家们以艺术创造的边缘并没有划定，需要各种各样的方式介入到这一领域中来。如此看来，戏剧实验在今天还是需要的。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教授，本文系作者2021年上戏导演系导师大师班系列讲座文稿节选，全文刊发于文汇报App）



王安忆评价话剧《长恨歌》，认为包括影视剧在内的所有改编中，“话剧最靠近我”。

编剧赵耀民用三幕戏来表现王琦瑶跨越四十年的情爱生活，从戏剧结构来说，前后对称，非常饱满。但看着看着，你会觉得有一点不满足。这种不满足源自于观众对人物结局的某种期待。

图为上海话剧中心2021年版《长恨歌》剧照。